

中原之子

眼科学界一代宗师

——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效房

本报记者 刘春兰 汪辉文 杨光图

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号楼,是一座老式病房楼。

在这座病房楼一楼一间普通的房子里,我国眼科学界一代宗师张效房老人继续发挥着余热。

5月9日上午,记者零距离面对张效房,凝视这扇拯救了无数患者的“心灵之窗”,试图探寻这位年逾九旬的“光明使者”弦歌不辍的动力之源。

他的祛痛“法宝”：全神贯注修改文章

走进张效房的办公室,记者看到,不足10平方米的地方,摆放着两张办公桌、一台电脑桌和几个书架,拥挤得让人几乎转不过身。办公桌上堆满了书刊、文稿,显得多少有点凌乱。

此时,身材高大的张效房,正深陷在四周堆满书籍的椅子上埋头修改稿子。

“这里太乱了,你们坐、坐。”见到记者进来,张效房赶忙站了起来,边说边给记者拉椅让座。

记者注意到,92岁的老人慈眉善目,精神矍铄。

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,眼不花,就是爱出汗,耳朵有点聋。”张效房站起身,摇着纸扇说,“你说话要大声点,我听不清楚呀!”

“张老,您的身体这么好,有什么养生之道?”记者好奇地问。

“我烟不沾,酒不贪,不吃保养药,有人说我身体好是因为我思想开朗,心态好,不计较。”张效房说,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,不跑步、不锻炼,洗脸吃饭后,除了到医院门诊、查房,给医学院的本科生和留学生授课外,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杂志上。

《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》是张效房主编的一份眼科权威杂志。30多年来,老人对杂志倾尽了心血。

“只要文章内容可取,对读者有益,我们都认真修改,并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交流,在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,在医学论文撰写方法与写作技巧方面,都诚恳地给他们提出建议。”张效房说,“我们并非好为人师,而是想把这份杂志办成眼科医生的良师益友。”

记者留意到,张效房正在修改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位医生的《泪道阻塞的手术治疗分析》论文。他先用红笔校第一遍,然后用绿笔校第二遍,第三次用蓝笔,注释时用铅笔。他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,还细心修改错字、标点符号,还把如何修改等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
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,一期来稿三四十篇,可想而知要耗费老人多少精力。而张效房却乐此不疲,常常改稿子到深夜两三点,他说晚上安静,出活。

“给作者改文章是我莫大的享受不说,还是一剂治病的良药。”张效房说,有一年,他去开会,在雪地里摔倒了,手腕骨折,打上石膏后疼痛难忍,晚上睡不着觉,用药物也不行。但是当他全神贯注修改文章,深入思考的时候,就不觉得手腕疼了。

这一发现,成为张效房战胜病魔的“法宝”。在前列腺摘除和肾脏切除手术以及脑梗塞手术后,他都是采用这个办法来祛除疼痛的。

此后,张效房到外地出差,也总是带着文章,在飞机、火车上,一有空就拿出来修改,不管它晚不晚点,有时候甚至希望晚点,他好把稿子改完。“有一次,因慌张张下飞机,把4篇文章落下了。幸好有登记,知道是哪几篇,赶快给作者写信道歉,让再寄来一份。”

“创办杂志只是一种工作,但这种工作,可以让更多的眼科后起之秀成长起来,对他们,对国家,都是一笔财富。”张效房说,希望《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》能够成为广大作者和读者的良师益友。



他的大胆发现：拯救了数千双眼睛

钩端螺旋体病,是一种细菌,一种病原体,属于内科病和热带病。

1963年,张效房打破了这一论断,他发现并证实了在我国曾爆发流行的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。这一发现拯救了全省数千内涝灾区群众的眼睛。

1963年夏秋,暴雨不断,豫东郸城等几个县内涝十分严重。

很多群众出现了发高烧、腿肚子疼等症状。经过注射青霉素等措施,效果不错。可是几天后,部分群众的眼睛却出现了酸疼,看不清东西等症状,用药、打针都无济于事,病症越来越厉害,以至数千群众双眼失明。

“你去调查,卫生厅派人协助,国庆节之前回来向省政府报告。”当时负责文教副省长亲自点将,张效房奉命前往灾区查探病源。

一下子几千人失明,这可是个大事情啊。他不敢怠慢,简单收拾行李,紧急赶往灾区。

“我们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病,这么多人眼睛都不好,从来没有过。”在灾区,张效房没日没夜地走访调查,询问村民。

“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同时患发热的病,然后又害眼的,没有。”每到一地,张效房都认真地与当地老中医了解情况。

“发烧病人没有黄疸,也没有死亡,所有人的病都治好了,就是眼睛问题,这真是千年不遇。”在当地医院,张效房向医生详细了解病症,生怕疏漏。

豫东遭遇水灾后,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医疗队。“你看那个发烧病是不是钩端螺旋体病?”一天,张效房遇到广州医疗队队长,于是向他请教。队长肯定地说:“不是,理由一

是没有黄疸,二是没有皮下血斑,三是没有死亡。凭这三点就说明不是钩端螺旋体病。”

其实,早在出发前,张效房就查阅了相关资料,发现这与南方的一种钩端螺旋体病很相似。这种病症在南方的发病率、死亡率很高,且病人都会出现脸色发黄,但并没有失明症状。

经过认真调查分析,张效房认为豫东水灾发烧病是钩端螺旋体病。

钩端螺旋体病属于热带病,当时广东、广西、福建都非常多,这位队长经验丰富,这让张效房又困惑起来。

经过实地勘察,张效房还是确定了自己的看法,而且一小部分按照“钩端螺旋体病”进行治疗的病病人也出现了康复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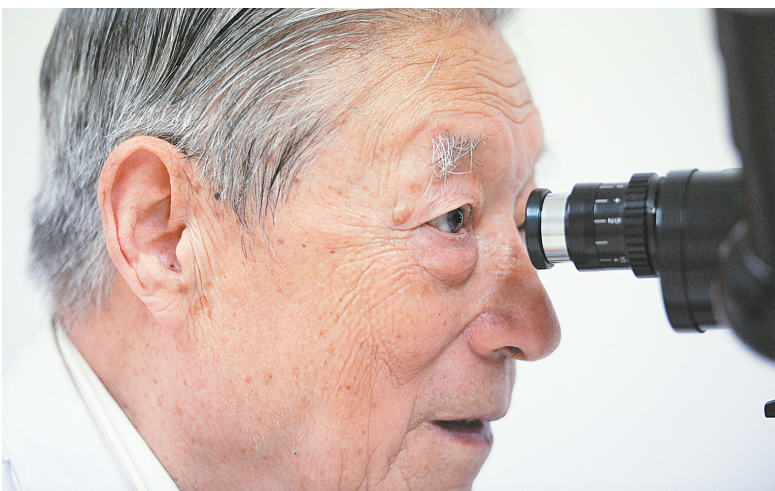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在汇报会上,张效房还是遭到了在座的权威内科、眼科专家的意见,遭到了他建议取患者血液进京检测,最终确定为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。

病症确诊了,医疗队进村排查、治疗,很快病情就得到了控制,大部分及时治疗的患者恢复了健康。

在沙眼防治方面,张效房也功不可没。建国初期,眼病非常严重,特别是沙眼及其并发症,危害最大,占致盲原因首位。张效房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他主动利用星期天,下乡为群众义诊。

“那时,每到星期天,我和几个年轻人就骑着自行车,带着干粮,深入到农村、学校、工厂,为群众义务治疗眼病。”张效房说,“有时候,白天农民下地了,上门找不到,我们就晚上登门,一旦发现病人,能够现场治疗的,就及时治疗;不能现场治疗的,就带回医院。”

在实践中,张效房创造出了的一种“石碳酸疗法”,便宜、简单,让当时沙眼肆意流行得到了控制,发病率逐年降低。



他的眼科基金：照亮无数“心灵之窗”

在疾病面前,医生与患者是休戚相关的。然而如今医患关系似乎成了“矛盾”、“问题”的代名词,甚至还时不时地“引爆”出极端事件。

“如果医院多点人文关怀;如果医生待病人如亲人,认真负责;如果医患真诚沟通,亲切交流,就不会发生这类恶劣事情。”张效房举例说,有位从豫西农村来的老太太,患青光眼,来这里住院治疗,医护人员都很关心她,护士为她修指甲、洗脚、擦洗身子,虽然最后经过手术,老太太的眼没有治疗好,但她仍感激地说,“我这一辈子,没有人待我这么好过,你们对我这么好和颜色色,儿女也没有对我这么好,我非常感谢你们。”

“我最痛心的几件事是,教师不负责,学生不认真,群众有眼疾,医生收红包!”张效房说,“当医生的,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,心灵之窗有了灰尘,还能把手术做好吗?”

提起红包,张效房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,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病人,因眼外伤在哈尔滨的一家医院接受手术,结果未能摘出异物。经人介绍,慕名来到郑州。

手术前一天,患者的爱人找到张效房

家,送上一个800元的红包。张效房一见,严肃地对患者说,“我是一名医生,是一名共产党员,从来就不收这个的!”

患者爱人坚持要给,张效房说:“你一定要给,我就收下,但明天上午,我就交到单位,你还送吗?”

术后,当纱布打开后,这位东北患者第一眼看见了和蔼可亲的张效房,当场失声痛哭:“真没想到,我的眼睛还能治好,还能看见东西,真是感谢张教授!你不仅技术好,医德更高。”

“我从来不收红包,不要药品回扣。至今我没有收过一个红包,没有要过一分钱的药品回扣。”前些年,张效房担任了诸多社会职务,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,不接受任何馈赠。出外会诊、手术演示,他也从来不要任何报酬。

1998年,河南省表彰首批“河南省科技功臣”,张效房是全省卫生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人,他将5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不说,还拿出多年的积蓄15万元购买了一台超声乳化机器,无偿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。“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”也由此诞生,专门用

于到国外留学和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。

2005,中美眼科学会授予张效房“金苹果奖”,奖金1000美元,他也捐给了学术基金。

2008年,张效房从美国访问回来,突患脑血栓,所幸手术后没有留下后遗症。老人说:“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,我想我这么大年龄了,不定什么时候说不行就不行了,钱是身外之物,既然没有带来,也带不走,所以我就把积蓄的100万元基本全捐给基金了。”

“我的钱从哪里来的呢?都是我省吃俭用积蓄的。我平常生活很简单,不吃山珍海味,不穿高档衣服,不吸烟,没有喝酒、喝咖啡等嗜好。”老人笑呵呵地说。

他的突出贡献：“张效房法”轰动世界

1978年,全国科学大会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成果。眼科成果全国只有两项,其中一项就是张效房的“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”。

当时,在异物摘取方面技术还比较落后。如何更好地取出异物,特别是非磁性异物,这是国内外眼科界长期以来探索的课题。

张效房暗下决心,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眼内异物摘出。他查资料,做实验,设计图纸,反复实践,完成创新和发明36项。他的这些安全、简单又行之有效的办法,被称为“张效房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”。

“张效房法”给无数眼外伤患者带来福音。“文革”期间,成都一位姓罗的技术员工作时,左眼被飞溅的铁屑刺入。可是,在成都手术未成功,先后辗转到西安、北京、上海也无人敢做手术。上海一位专家推荐说:“你们去河南找张效房试一试。”

罗技术员一行来到郑州。3个小时的手术,铁屑被张效房顺利取出。

“罗技术员眼睛里的铁屑是在河南取出来的!”当陪护人员把电话打到了厂里时,厂里正在开“万人大会”。厂领导将这一喜讯在大会上宣布,全场掌声雷动,经久不息。

张效房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累累硕果。1976年,他的专著《眼内异物定位与摘出》出版,成为国际上第一部系统探讨眼内异物的专著。

1982年,在美国举行的第24届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上,老人的《三千例眼内异物摘出的体会》报告,由四种语言同步翻译,引起轰动。当地报纸以《来自中国的经验》为题进行报道。会后,张效房先后应邀到美国、日本的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专题报告。同时,众多的国外同仁也先后来到河南取经。

“在眼内异物摘出方面,我国目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。”1984年,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他主编的《中国医学科学年鉴》中自豪地说。

1996年9月,美国联邦眼外伤登记中心授予张效房“眼外伤手术方面突出成就奖”。2005年,张效房获得中美眼科学会“金苹果奖”。

张效房出名了,但他攀登的脚步并未停止。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白内障手术。

“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因费时、不安全、效果差而被淘汰,取而代之的超声乳化手术又因设备昂贵、操作复杂而难以很快在国内普及。”张效房说,“如何寻找一种安全、经济、简单、有效的术式,一时成了我们思考的问题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,他从日本引进了手法小切口白内障手术,并反复实践,改进,形成了效果好、易于掌握、节省费用、适于基层开展的“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”,被定位“视觉第一中国行动”医疗队和定点医院规范手术方法。

2002年,在美国眼科学万人年会上,张效房的《中国河南大范围白内障手术复明工作经验》报告,再次轰动大洋彼岸。

无论是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,还是白内障摘出手术,张效房都走在了世界前列。

后记

由于职业的缘故,记者多次与张效房老人谋面,但因为老人的高龄和声望,总是怀着一颗虔诚之心,去仰慕这位德高望重的眼科泰斗。

这次与张效房零距离接触,记者再一次受到了心灵的洗礼。

老人发挥余热的场所简单得近乎“简陋”,让人不由心生敬意。老人就这样蜗居在四周堆满书稿的桌子旁埋头校稿,因为爱出汗,手拿一把折扇来降温。

老人甘做“嫁衣”的精神令人敬佩。对于每篇稿子,他都要亲自看,先用红笔校第一遍,然后用绿笔、蓝笔校二、三遍,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,还细心修改错字、标点符号。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,一期来稿三四十篇,可想而知要耗费多少精力。

九旬老人每次总是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殊不知,老人曾患过四次病,得过肾癌,患过脑血栓,所幸他都挺过来了。老人忘记身体疼痛的“法宝”竟是全神贯注改稿子。

“愿做春蚕,吐丝不已,至死方休。甘当蜡烛,奉献光明,耗尽自身。”这是在九旬寿辰上老人写的自勉感言。短短诗句浓缩了老人悬壶济世、护佑苍生的毕生追求,也是他“光明使者不老松”美誉的真实写照。